

蜀道诗文审美张力的构成

李 锐

(陕西理工学院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摘要] 蜀道在历代史书中一直是指“京都长安或洛阳入蜀的道路”,“张力”在英美新批评看来是“冲突中见稳定”的诗歌结构模式。蜀道诗文的审美魅力在于:“汉三颂”文体写作中张力的存在,引发了现代学者们对于历史事实的求证。“蜀道难”与“蜀道易”的建构与解构,在历史时空中构成了此消彼长的张力,折射了时代变迁和人生变故,令我们惊叹文化符号的无限意义。蜀道抒怀诗中的那种拯救与逍遥构成的张力,使我们更加体会到,蜀道因其独特山川和历史遗存,可以为不同的人提供精神家园的载体。

[关键词] 蜀道; 诗文; 审美; 张力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936(2014)01-0027-06

蜀道 地理意义上的理解就是将蜀(今四川)作为目的地而开通的道路,应当包括周边入蜀之道路,包括“自三峡溯江而上的水道,自云南入蜀的焚道,自甘肃入蜀的阴平道和自陕西汉中入蜀的金牛道、米仓道”^{[1]26}。但就像任何政区地图需要确定一个行政中心一样,我国历代史书一直把京都作为中心,也作为辐射全国的起点,所以蜀道在历代史书中一直是指“京都长安或洛阳入蜀的道路”^{[1]26}。从古至今,蜀道一直是文人骚客们咏叹和描写的重要题材,留下了众多诗文。“张力”一词最早由阿伦·退特在 1938 年发表的《诗的张力》一文中提出,后来 M·H·阿伯拉姆在《简明文学词典》的“张力”条目下总结说:许多新批评家用“张力”一词来描述诗歌严肃和幽默之间的平衡、或“冲突应力的集合”、或对抗趋势的和谐、或其他任何“冲突中见稳定”的模式^[2]。英美新批评甚至认为伟大的诗篇都是内在的几种冲动取得平衡的结果。探讨蜀道诗文的审美张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掘其艺术价值和魅力之所在。

一、纪实与赞颂“汉三颂”作品的审美张力

纪实性的蜀道诗文,其描述对象常常与道路建设活动相关联,其表达的情感也以敬仰与赞美为主。这些作品,常以勒石刻碑的方式记载和传承,其代表性的作品是陇右蜀道沿线的《西狭颂》摩崖石刻,故道沿线的《郾阁颂》摩崖石刻,褒斜道沿线的《石门颂》摩崖石刻、二十四孔阁石刻,灊骆道上的华阳黑水河山崖的石刻,金牛道上的梓潼长卿石屋与西崖寺石刻、剑阁鹤鸣山摩崖石刻,等等。在纪实性的蜀道诗文中,比较特殊的是所谓“汉三颂”《石门颂》、《郾阁颂》和《西狭颂》,因为它们把赞颂与纪实整合在一起了,从而具有了很强的审美性。

被人们喻为“国之瑰宝”的《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俗称《石门颂》)是这类纪实性蜀道诗文的代表。作者为汉中太守王升,写于东汉建和二年。颂词以道路与山泽关系为“起”,以蜀道在汉帝国统一全国中所起的作用为“承”,以褒斜道当下的艰险为“转”,以杨孟文多次上书争取复修,使得褒斜道成了通途为“合”。颂词的主题是强调经杨孟文的努力,修复后的褒斜道变得便利易行,促进了民众的生产

[收稿日期] 2013-11-03

[作者简介] 李锐(1954-),男,陕西安康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教授。

和生活,交流和沟通“自南自北,四海攸通。君子安乐,庶士悦雍。商人咸情,农夫永同。春秋記异,今而紀功。垂流亿載,世世叹颂。”^{[1]40}

故道上留存的《郾阁颂》是东汉灵帝(刘宏)建宁三年(170年),为记载武都郡太守李翕倡导修建棧道上的析里桥郾阁后在石崖上镌刻的颂词。作者为“掾史”仇审,是李翕手下的贴身随从,书者为仇审的儿子仇绋^[3]。嗣后由工匠镌刻。颂词以析里(今陕西省略阳县徐家坪乡)地理险要、水流湍急、道路艰难为“起”,以郾阁棧道更为险峻为“承”,以李翕到任后有建立功业造福一方之心决定修建析里大桥为“转”,以仇审受命督建析里桥郾阁,使车毁人亡之险路成为“安宁之石道”为“合”：“閭閻充庶兮百姓欢欣,金曰太平兮文翁复存。”

陇右蜀道上的《西狭颂》刻于东汉建宁四年(171年),为记载武都郡太守李翕决定整修西狭道路而作的颂词,作者依然是先一年在故道上作《郾阁颂》的仇审。可能是李翕接连修路架桥,深得民心,《西狭颂》的颂词以描述李翕天资、性情和家世为“起”,以李翕受朝廷委任出任武都郡太守极力推行仁政为“承”,以郡西狭道路危难阻峻为“转”,以李翕令部下组织全面整修道路使之“坚固广大,可以夜涉”,给民众带来交通便利为“合”：“行人欢悃,民歌德惠,穆如清风。”

“汉三颂”书写的是道路建设者对于恶劣环境的改造,表达的是战胜艰险建成通途的喜悦,尤其是对于调配资源具有决策权的地方官员们为民造福的赞颂。在作者看来,主要是他们的努力,使得蜀道成为南来北往沟通关中原与四川盆地的大通道,方便了民众的沟通与货物的交流。

“汉三颂”的张力主要表现在文体写作方面。刘勰在《文心雕龙·颂赞第九》中曾经讲到了“颂”体写作范式的变迁。颂本来是祭神的舞歌,“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4]。后来,民众常用简短的词语或称颂合民意的作为,或嘲讽不合民意的行为,于是“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颂体开始记述人间之事,“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又覃及细物矣。至于秦政刻文,爱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在写作实践中,颂体必须遵守的写作范式是“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4]从刘勰总结的颂体写作范式中,我们至少可以析出如下构成张力的条件:一是立意必须融会经典,符合儒家的规矩^①;二是话语必须清新明丽,可读性强;三是手法可以铺陈扬厉,但要朴素写实;四是语气必须恭敬谨慎,表达敬慕之意。

考虑到“汉三颂”产生在《文心雕龙》之前,加之刘勰在写作上也使用了赋体的写作手法,因此“汉三颂”的张力,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两种:在思想情感上的张力是“发乎情,止乎礼”,在话语表达上的张力是写实与铺陈。在《石门颂》、《郾阁颂》和《西狭颂》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种张力。作者情感上要赞颂汉中太守杨孟文和武都太守李翕,但绝非溜须拍马过渡夸张,而是言必有据符合儒家的道德理想;话语表达上,既如实记载事情整个过程但手法上又具有文学性的铺张。其审美效果在于,既具有汉赋那样的形式美感,清丽而激动人心,又具有善的中规中矩的道德指向,朴实而可亲。

有意思的是,“汉三颂”的这种张力,给后来研究者们留下了许多解释空间。比如《石门颂》中的“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就有巨大的空白需要填充,因为从上下文语境看,“道由子午”是“出散入秦”的方式,所以,郭荣章先生讲“出散入秦,当时只能走故道(一名陈仓道),根本不经过子午道。就文义而论,疑原文有误。”^{[1]43}而马强先生则讲“《石门颂》明言‘道由子午,出散入秦’,来往路线交待甚明,结合《汉书·高祖本纪》:‘项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从杜南入蚀中’,说明刘邦赴汉中所行乃长安以南的子午道,‘出散入秦’与《汉书·曹参传》所载‘从还定三秦,初攻下辩、故道、雍、郿[tái]’恰相印证。”^[5]各种不同解读的存在,也增加了《石门颂》作为颂体写作的审美魅力。

二、建构与解构“蜀道难”作品及文化符号的审美张力

蜀道诗词中有一种特殊现象,这就是将蜀道作为一种“难”的文化符号,寄寓文人雅士的思想情感。西方学者厄姆贝托·埃科给符号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符号就是任何可以拿来有意义地代替

^①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解释“典雅者,鎔式经诂,方轨儒门者也。”

另一种事物的东西。”^[6]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除了用语词外还大量地使用非语词手段来进行交流,例如,手势、姿势、信物、服饰、发式、香味、红绿灯、上课铃声等等,都指向一种意义,并实现交流。在我国,厨师用鸡爪做一道菜,被称之为“凤爪”,赋予吉祥之意;《红楼梦》中赋予香味以高雅和粗俗的意味,“梅兰竹菊”也都有自己特殊的所指。蜀道被人们赋予的所指就是艰难。

“蜀道难”作为文化符号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最早赋予蜀道艰难意义的是《史记·项羽本纪》中的范增。他给项羽建议“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至南朝“蜀道难”成为乐府曲牌,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在《蜀道难二首》中描绘了巫山巴水的险急和笛声猿啼的荒凉“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笛声下复高,猿啼断还续。”继之有南朝梁陈间诗人阴铿的《蜀道难》描述了灵官峡(今甘肃两当嘉陵江畔)的险峻、栈道的破败和行路的艰难“轮摧九折路,骑阻七星桥。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自此,蜀道与艰难联系起来了,“蜀道难”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由于“蜀道难”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许多文人雅士便常常借“蜀道难”的文化符号,展开丰富的想象,来寄寓自己的情感态度和对于人生社会的领悟。这就使得蜀道诗文在“蜀道难”的文化符号之上,又多了一层意义指向。

最典型的寄寓性蜀道诗文当属李白的《蜀道难》。罗联添先生曾指出:“(李白)一生不曾涉足自青泥岭至剑阁一段蜀道。其所描述路途之艰险,山水景物之奇特,部分出于想象,大部分系取旧籍,如扬雄《蜀王本纪》、《蜀都赋》,张载《剑阁铭》、左思《蜀都赋》等所叙,加以剪裁增饰而成。”^[7]如果说罗联添先生是从作者角度强调李白《蜀道难》的寄寓性特征的话,那么刘刚先生则从文本角度强调了李白《蜀道难》对于蜀道地理布局空间位置的依赖。他在对李白的《蜀道难》进行文学地理学解读中,认为李白《蜀道难》文本结构与长安到益州的蜀道地理位置具有一致性,“古入蜀诸道之经由已明,求李白《蜀道难》所述之蜀道即可迎刃而解”。李白《蜀道难》“先以时间为经,由古及今,次序写来;后以空间为纬,由西而东,铺排蜀道。铺写中,又择其险要,例举关山,明标暗点,备述诸条蜀道”^[8]。两位先生的研究从作者和文本角度证实了李白《蜀道难》是将“蜀道难”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来看待的,由此也可确定:李白以想象和激情在艰险蜀道的符号展示中,寄寓了入蜀入幕为官为僚的艰难和危险。

与李白同时代的杜甫也写有蜀道诗,计秦州纪行诗11首,同谷纪行诗13首。其中《泥功山》地处同谷境内,应入同谷纪行诗^[9],同时《泥功山》也是最典型的寄寓性蜀道诗词。如果说李白依据蜀道地理位置来结构“蜀道难”的文化符号,那么杜甫则是用脚丈量了由秦州(今甘肃天水)经同谷(今甘肃成县)到锦城(今四川成都)的整个陇右蜀道来细述“蜀道难”文化符号的。因此,作为文化符号的“蜀道难”就显得真实具体,其寄寓也就更为深沉厚重。《泥功山》是这样刻画“蜀道难”文化符号的“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泞非一时,版筑劳人功”,蜀道修远,泥泞,绵绵阴雨,维护不易;尽管如此,但人的追名逐利天性成为奔走于蜀道的动力,“不畏道途永,乃将汨没同”;蜀道众生虽孜孜以求,但最终的结果是“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哀猿透却坠,死鹿力所穷”,虚耗时间,搭上生命而毫无结果。因此要谆谆劝导南下益州者,一定要慎重选择,“寄语北来人,后来莫匆匆”。相较于李白《蜀道难》所寄寓的警告式的情感态度,杜甫《泥功山》则显得语重心长!

不同于李白、杜甫在艰难的蜀道描写中寄寓自己的思想情感态度,元曲中的“蜀道难”变异为一种语词式的文化符号,亦即实写现实具体的生活情境,插入语词式“蜀道难”的文化符号,寄寓人生道路的艰险。这样一来,“蜀道难”开始脱离蜀道描写,愈来愈具有约定俗成性和普遍认同性,成为一个所指意义为艰难的文化符号。例如,元代词人杨果的《太常引·送商参政西行》散曲“一杯聊为送征鞍。落叶满长安。谁料一儒冠,直推上,淮阴将坛。西风旌旄,斜阳草树,雁影入高寒。且放酒肠宽,道蜀道,而今更难?”为朋友商参政饯行,想到书生做官,将面临险恶官场,高处不胜寒,这就像行走蜀道入官入幕一样,充满了不可知的风险和艰难。于是不胜酒力也要豪饮,复杂的别情尽在酒中!马致远的《四块玉·马嵬坡》散曲虽是写唐玄宗宠爱杨玉环历史事件,但也使用了“蜀道难”的文化符号,寄寓对统治阶级荒淫误国的揶揄态度“睡海棠,春交晚,恨不得明皇掌中看。霓裳便是中原乱。不因这玉环,引起那禄山,怎知蜀道难!”

伴随着“蜀道难”文化符号的建构,也发展起了“蜀道易”的解构。在中唐有一个叫陆畅的文人就反

其道而行之,作了“蜀道易”来解构“蜀道难”的文化符号。

据晚唐李肇《尚书故实》记载“陆畅,字达夫。尝为韦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南康大喜,赠绫罗八百疋。南康薨,朝廷欲绳其既往之事,复阅先所进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与者,因欲构成罪名。畅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见所进兵器刻定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释。《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畅感韦之遇,遂反其词焉。”^[10]韦南康即韦皋,其在贞元元年(785)到永贞元年(805)担任了剑南西川节度使。陆畅想寄托的意图是,本来极度艰难的蜀道,由于有了韦皋的善政,而变成了坦途。

不同于陆畅的反其意而用之的解构,后来的文人雅士们则用“蜀道易”来表达个体的愉悦之情。北宋晁说之《题杨如晦二画<蜀道图>》诗“山钩树白何年岁,流瀑可听下无地。行人愁绝却无愁,始信宜歌蜀道易。”^[11]杨如晦在《蜀道图》中描绘了蜀道的美景和为行路艰难发愁却又看不到愁色的蜀道旅人。晁说之观画时兴之所致,用了“蜀道易”来表达自己观赏时的愉悦之情。南宋范成大,曾赴蜀任职,后来也写有几首借“蜀道易”来表达自己彼时彼地情感态度的作品。《清湘驿送祝贺州南归》写道“万里归来蜀道易,四愁诗成湘水深”^{[12]卷十五};《点心山》写道“游人贪胜践,姑吟蜀道易”^{[12]卷十八};《瞿塘行》写道“剑阁翻成蜀道易,请歌范子瞿塘行”^{[12]卷十九}。

但到明代对于“蜀道难”又有了前文所述的“陆畅式”的反其意而用之的解构,这就是方孝孺的《蜀道易有序》^[13]:

王道有通塞,蜀道无古今。至险不在山奥水,只在国政辨人心。六朝五季时,王路嗟陆沉。遂令三代民,尽为兽与禽,当时岂惟蜀道难。八荒之内皆晦阴,戎夷杂寇盗,干戈密如林。今逢天子圣,贤王之德世所钦。文教治飞动,风俗无邪淫。孱夫弱妇怀千金,悍吏熟视不敢侵。蜀道之易谅在此,咄尔四方来者,不惮高山江水深。

据《明史》卷一一七记载,洪武十一年(1382)太祖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朱椿按照传统的礼教文化治理蜀地,聘请方孝孺为世子之师,待以殊礼。尽管方孝孺知道陆畅为媚韦皋而轻浮地作《蜀道易》,但他表明自己是发自内心的写下《蜀道易》。既然“昔唐李白作《蜀道难》,以讥刺蜀帅之酷虐”,他也就反其意而用之,就要用《蜀道易》来赞颂朱椿的仁政。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文化符号的“蜀道难”其张力在于:建构和解构随着历史变迁和个人遭际而消长。当诗人在乱世感慨仕途险恶人生艰难时,常常借“蜀道难”来寄寓自己这种感喟,从而不断地对“蜀道难”进行建构;当诗人在盛世表达自己的情趣或达观的胸怀时,则常常用“蜀道易”来寄寓个体的愉悦之情,从而不断地对“蜀道难”进行解构。如果说作为文化符号的“蜀道难”体现着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陈规的话,那么“蜀道易”的解构意图,则更侧重于个体此时此地的心绪表达,从而更接近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哲学追求,有一定的现代意味。

三、拯救与逍遥:蜀道咏怀诗的审美张力

蜀道咏怀诗是指行经蜀道之人被沿线富有特色的景观打动,引起了情感波澜,浮想联翩,进而诉诸笔端的诗作。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唐、宋以后蜀道交通也兴盛起来,蜀道抒怀的诗词也日趋增多。据马强先生考辨,唐代诗人沈佺期、岑参、元稹、武元衡、于武陵、薛能、胡曾、郑谷等诗人,均经行过蜀道,来过汉中^[14],“计有五十余位诗人有蜀道诗传世”^[15]。到了宋代,相对咏蜀道诗文较少,但石介、赵抃、文同、苏轼、李廌和陆游也都经行过蜀道,留下诗篇。元明清三代,咏叹蜀道诗词散曲仍佳作不断,经行过蜀道的杨慎、方孝孺、何景明、杨一清、王士禛、宋琬等都有不少颇具文学审美价值的诗词作品。

阅读抒怀性的蜀道诗词,扑入眼帘的是文人雅士们那些鲜明而富有个性化的风格,如沈佺期诗歌的冷寂,岑参诗歌的清新,元稹诗歌的艳丽,李商隐诗歌的典雅,郑谷诗歌的含蓄,杨慎诗歌的清新,赵抃诗歌的劲健,陆游诗歌的洒脱,等等。取个性风格视角研究蜀道诗词,可以窥出蜀道诗词的审美特色,但前人论述颇多,本文不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抒怀性的蜀道诗词在个性的发挥中,隐藏着普遍性的思想情感方式,而通过这种情

感方式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又能洞悉文人雅士们的文化价值追求。于是,蜀道与文人雅士们的血脉关系,也就能显现出来。

蜀道连接京城长安与蜀地益州,本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政治、军事意义,而历史上众多的重大事件也在蜀道沿线上留下了遗存。这就使得行经蜀道的文人雅士们,自然会联想到历史上的典故,不由自主地生成指点江山式的拯时济世念头。此类蜀道诗词最集中地体现在李商隐的《筹笔驿》和陆游的《山南行》中。

筹笔驿地处蜀道南栈,又称朝天驿,相传三国时诸葛亮曾在此筹措粮草以准备伐魏。李商隐的《筹笔驿》写道“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管乐有才终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李商隐在诗中写的是诸葛亮的英武和出师未捷的悲剧,但其中表达诗人自己情感的关键词则是“梁父吟成恨有余”的“恨”。此处虽然有“遗憾”之意,但查《说文解字》“恨,怨也,从心艮声”,也有抱怨之意。由此看来,李商隐内心深处依然有拯时济世的英雄情结。陆游的《山南行》更直接“我行山南已三日,如绳大路东西出。平川沃野望不尽,麦陇青青桑郁郁。地近函秦气俗豪,秋千蹴鞠分朋曹;苜蓿连云马蹄健,杨柳夹道车声高。古来历历兴亡处,举目山川尚如故;将军坛上冷云低,丞相祠前春日暮。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一方面写蜀道之行感受到“气俗豪”,看到的历史上多少“兴亡处”,一方面则抒发出“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的统一之志。

蜀道作为古代连接北方和西南的大动脉,要翻越秦岭巴山,要渡过众多河流,要行经暖温带和亚热带两个气候带,要体验与北方民众迥然不同的生活习俗。文人雅士蜀道行旅客观地将诸多地域差别连接并集中为一条历时性线索,这必然给蜀道行经者在比较中带来鲜明而深刻的观感和印象,引发个体的生存感受,促使个体回到自己的生存状态,思考自己的人生归宿,从而生成一种逍遥的人生态度。此类蜀道诗词最集中地体现在清代王士禛的诗作中。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明亡时他年仅10岁。清顺治十五年,王士禛中进士,后升迁至刑部尚书的高位。据王利民、查紫阳考证,王士禛在康熙十一年和康熙三十四年两度入川,都是走嘉陵道北段,然后折向褒斜道,最后走剑阁道的阆中支线,途中所作诗歌结集为《蜀道集》和《雍益集》^[16]。一位高官行经在蜀道上,仿佛从牢笼中挣脱出来一样,处处感到新鲜,也有一种解脱。因此,王士禛序王士禛诗曰“贻上顾岸然不屑犹昔也,高斋视事之暇,泼墨赋诗,击钵征句,数千百言立就,风格之高逸,笔墨之曲折,盖若得江山之助。”自然山川与诗人性情缱绻绸缪,美丽意象与和婉声韵相得益彰,神韵中又折射生命脆弱短暂的伤感。例如《七盘岭》:“七日行褒斜,目聩耳亦聋。绝顶忽开豁,白日当虚空。褒水出谷流,汉江绕其东。巴山跨秦蜀,蜿蜒连上庸。川原尽沃野,天府如关中。桔柚郁成林,稻苗亦芃芃。襄阳大舶来,千里帆樯通。当年号天汉,运归降准公。将相得人杰,驱策芟群雄。一战收三秦,遂都咸阳宫。智勇久沦没,山川自葱茏。跋马向褒国,日落烟濛濛。”从出褒谷开始,诗人的舒畅情绪与秀丽的汉中平原融为一体,陶醉中联想到刘邦当年出散入秦,苍翠的山川却又展现在眼前,历史的沧桑巨变转化为空间的自然永恒,恰在这生之寄托的彻悟中,猛然惊醒地回到现实世界,“跋马向褒国”必须继续行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奈,像朦胧的日落一样油然而生。这与杨慎“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拯救与逍遥构成了蜀道抒怀诗词的永恒的审美性张力,而这种张力根植于蜀道的历史和地理。无论什么样的文人雅士,总能在蜀道行走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生成无限的眷恋之情。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可见,取英美新批评派“张力论”的文学结构模型来发掘蜀道诗文的审美魅力,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把握蜀道诗文的美学特征,也有利于我们追根溯源地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蜀道诗文的精品进行新的分析。

蜀道诗文中张力的存在,引发了现代学者们对于历史事实的求证。“蜀道难”与“蜀道易”的建构与解构,在历史时空中构成了此消彼长的张力,折射了时代变迁和人生变故,令我们惊叹文化符号的无限

意义。蜀道抒怀诗词中的那种拯救与逍遥构成的张力,使我们更加体会到,蜀道因其独特山川和历史遗存,可以为不同的人提供精神家园的载体,才为一次又一次人所迷恋!

[参 考 文 献]

- [1]郭荣章.石门摩崖石刻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26.
- [2]M. H. 阿伯拉姆.简明外国文学词典[M].曾忠禄,郑子红,邓建标,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367.
- [3]严如煜.汉中府志卷三十一“拾遗”[M].清嘉庆十八年续修,1925年重刻本.
- [4]刘勰.文心雕龙[M].龙必琨,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95,101.
- [5]马强.蜀道文化述论[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4).
- [6]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38.
- [7]罗联添.李白《蜀道难》寓意探讨[M]//唐代文学学会.唐代文学研究第五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8]刘刚.《蜀道难》的文学地理学解读[J].社会科学辑刊,1993(6):148-150.
- [9]孙启祥.《泥功山》属秦州纪行诗吗?[M]//孙启祥.汉中历史文化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337.
- [10]李焘.尚书记事[M]//宝颜唐秘笈.文明书局,民国十一年出版.
- [11]晁说之.题杨如晦二画[M]//四部丛刊续编本《嵩山文集》卷四.
- [12]范成大.清湘驿送祝贺州南归[M]//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13]方孝孺.蜀道易有序[M]//四部丛刊本《逊志斋集》卷二十四.
- [14]马强.唐代诗人汉史地诗考略[M]//马强.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99-120.
- [15]马强.论唐宋蜀道诗的文化史意义[M]//马强.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267-268.
- [16]王利民,查紫阳.秦蜀驿道上的神韵与性灵[J].中国韵文学刊,2003(1):33-40.

[责任编辑:朱飞]

(上接第26页)

计9天时间。传世书记载的从兴元府到凤翔府的行程(9天)与出土的敦煌文献中记录的归义军使团所花费的时间(9天)完全是符合的。唐僖宗行在朝廷到达凤翔府后,由于京师长安宫殿被战乱焚毁,修葺未完成,只得暂时停留在凤翔。唐僖宗銮驾返程终点到达凤翔府,但唐宋史书未明确记录所走为哪条道路。严耕望先生通过考察唐三帝(玄宗、德宗、僖宗)四次南幸兴元,往返八程道路,“除去德宗去程及僖宗第一次去程取骆谷道之外,其余六次皆取散关道,无一取(汉魏)褒斜古道者”。如果严先生据此去说明僖宗两次归程,“虽不知取褒城—凤州道,或者取兴州—凤州道,但可以肯定,绝不是取眉褒间汉魏之褒斜古道可知也”的结论仅仅是推测,而缺乏历史实际证据的话,那么,前述敦煌文献中明确记载的归义军使团从兴元府到达凤翔府所用去的时间(约9天),不仅与唐宋时期兴元府至凤翔府之间“褒斜道”的里程数之间高度契合,而且也与传世的唐宋史籍中明确记载的唐僖宗车驾从兴元府到达凤翔府所用去的时间(约9天)完全一致的情况,已可以证实严耕望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也就能补正史记载的缺漏与不足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契合,证明了光启三年唐僖宗銮驾回京的路线是沿着“兴元府—褒城—回车戍—凤州—散关—凤翔府”这条晚唐时期沟通关中与汉中的主要的交通干线。这正是敦煌文献中写于唐光启三年的公文的无比珍贵的历史价值之所在。

[参 考 文 献]

- [1]四川人民出版社,等(编).英藏敦煌文献[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241.
- [2]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728,729,732.
- [3]郭荣章(编著).石门石刻大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126,128.
- [4]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88.

[责任编辑:朱飞]